

明代温补学派对丹溪学派滋阴治法的继承与发展

宋佳, 汤巧玲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滋阴治法自古有之, 然丹溪学派与温补学派尤为侧重, 丹溪学派基于“阳有余阴不足”之论, 提出滋阴降火大法, 形成以四物汤加知母、黄柏为核心方剂的治疗思路; 温补学派在命门学说的探讨中, 在“阴阳一体”思想的指导下, 阴中求阳, 阳中求阴, 临床尤为重视真阴不足之证, 并形成了以六味丸为核心方剂的治疗思路。无论是阴虚的内涵、病机, 还是滋阴的治法, 温补学派在丹溪学派的基础上均有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 滋阴; 温补学派; 丹溪学派

[中图分类号] R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19) 03-0042-03

DOI: 10.13457/j.cnki.jncm.2019.03.012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eatment Method of Nourishing Yin in Danxi School by Warm-recuperation School in Ming Dynasty

SONG Jia, TANG Qiaoling

Abstract: The treatment method of nourishing yin has been in existence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the Danxi school and the warm-recuperation school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n excess of yang with deficiency of yin", the Danxi school put forward the method of nourishing yin and reducing fire, forming a treatment idea of Siwu tang adding common anemarrhena (Zhimu) and phellodendron (Huangbai) as a core prescription;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life-gate theory, the warm-recuperation school reinforced yang from yin and yin from ya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idea of "unity of yin and yang", and clinically it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yndrome of deficiency of genuine yin and formed a treatment idea with Liuwei pills as the core prescription. Both in the connotation and pathogenesis of yin deficiency and the treatment method of nourishing yin, the warm-recuperation school has gained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n the basis of Danxi School.

Keywords: Nourishing yin; Warm-recuperation school; Danxi school

阴虚一证, 历来为广大医家所重视, 早在《素问·调经论》对“阴虚”临床表现有如下描述“阴虚生内热奈何, ……有所劳倦, 行气衰少, 谷气不盛, 上焦不行, 下脘不通。胃气热, 热气熏胸中, 故内热”, 《素问·疟论》更是高度概括“阳盛则外热, 阴虚则内热”。《伤寒论》中也论及阴虚病证, 如“阳盛则欲衄, 阴虚小便难”, 《金匱要略》不仅提及阴虚的病证, 如“阴气衰者为癫, 阳气衰者为狂”, 还对阴虚的病机进行了阐述, 如“阴气孤绝, 阳气独发, 则热而少气烦冤, 手足热而欲呕”, 而至隋唐时期, 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等均记述了阴虚病证、病机及治疗方药与腧穴。上述论述均指出阴虚则热, 并为后世治疗阴虚病证, 采用滋补阴气的治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金元以前, 医家对“阴虚”一证的认识在不断提高, 治疗方法也在不断完善。至金元, 中医学进入一个新说竞出的黄金时期, 先是刘河间起而探讨火热病机, 用药擅寒凉, 临床以辛凉解表、表里双解、攻泄里热等法治疗火热病证。后至元代朱丹溪, 在继承河间学说的基础上, 引入理学思想, 精辟论说, 并提出“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火论”, 将“滋阴”从单纯的治则治法概念发展成为有哲学指导、理论结构、系统方药和临床验证的相对完整系统的滋阴学说, 故而又被后世称为滋阴学派。在治疗方面, 朱丹溪的重大贡献是阐明了阴虚火旺的机理问题, 认为阴虚与火旺密切相关, 阴虚必然导致火旺, 而火旺又必致阴液更伤, 因此临床用药补阴必兼泻火, 而泻火也即所以补阴, 他将阴虚分为阴津虚与阴血虚, 因此补阴有补阴津

[收稿日期] 2018-10-19

[基金项目] 北京中医药大学新奥奖励基金项目 (2016XAJLJJ-007)

[作者简介] 宋佳 (1983-), 女, 副教授, 研究方向: 历代医学流派及名医思想研究。

与补阴血之分。补阴津用大补阴丸，补阴血用四物汤加知柏，这些理论及治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明代，温补学派在命门学说的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以六味丸为基础方、熟地黄为主药的补肾水大法，将中医学的“阴虚”理论及“滋阴”治法进一步完善。

1 理论上的发展——从阴阳对立到阴阳一体

1.1 丹溪学派的“阳有余阴不足”论 朱丹溪师从理学大师许谦，具有较高的理学造诣，又拜师钱塘名医罗知悌，从罗知悌那里学习了刘、李、张三家之学，可谓金元四大家中的集大成者。朱氏的医学思想受理学影响很深，他以理学中的太极动静之理为基础，提出了著名的“相火论”，而相火论的主要内容是相火之常与相火之变。朱氏认为世间万物皆以动为主，而在人体的“动”则是相火的作用，所谓“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又说相火是“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说明相火对维持人的生命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太极动静并存，且有一定的限度，人体相火的动静也应“动而中节”才能保证五脏功能正常。因此朱氏强调“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指出人体健康的关键是相火要动静适中，若动的太过，就会致病而死，动的太过即是妄动。而引起相火妄动的常见原因有情志过极、色欲无度、饮食厚味等多方面因素，而相火妄动就会煎熬阴液，产生阴虚火旺的病证，如朱丹溪所言“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

在此基础上丹溪结合太极之理与天地自然之象，提出了“阳有余阴不足”论，认为人禀天地之气生，由于天大于地，日明于月，因此在人体也是阳有余阴不足，此外，纵观人体生、长、壮、老、已一生，“男子十六岁而精通，女子十四岁而经行”，可见阴气之难成，而《黄帝内经》言“年四十阴气自半而起居衰矣”，又说“男子六十四岁而精绝，女子四十九岁而经断。夫以阴气之成，止供得三十年之视听言动而先亏矣”，因此从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过程来看，也是阳有余阴不足。除此之外，人之情欲无涯，更易耗损阴精，加之当时医界受《和剂局方》影响，用药偏于香燥，易耗伤五脏之阴，从而加剧“阳有余阴不足”的状态。因此丹溪将人体生理与病理现象结合，认为“阳有余阴不足”不但是疾病的常见病理，也是人体早衰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临床治疗中，主张“滋阴降火”以治疗阴虚火旺之证，养生时主张“养阴抑阳”以保养阴气。

1.2 以张景岳为代表的“阳常不足阴本无余”论 相对朱丹溪将理学思想融入中医理论，温补学派张景岳则侧重于将易学思想与中医理论相结合，他提出“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黄帝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哉”。张景岳结合易学思想，针对朱丹溪提出的“阳有余阴不足”论，提出了“阳常不足阴本无余”的思想，并从“形气之辨”、

“寒热之辨”与“水火之辨”三方面论证了人体阳气的重要性，并提出“难得而易失者惟此阳气，既失而难复者亦惟此阳气”、“得阳则生，失阳则死”等观点。

这二者看似观点对立，一者重视阴精，一者重视阳气，但实则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丹溪与景岳所谓之阴阳在概念上有所不同，前者从广义上讲是动与静的关系，后者则侧重于事物的阴阳属性。从狭义上说，前者偏重相火炽盛，而非人体真阳有余，后者是指真阳之重要性，并不否认相火炽盛。另外丹溪更着重从病理角度阐发人体阴阳之间的关系——“阳有余”指的是“相火妄动”，“阴不足”则指的是“阴精不足”；而景岳则更着重从阴阳一体、阴阳互根互用的角度阐发人体阴阳之间的关系——阳气匮乏，真阴亦不足，真阴不足，阳气亦匮乏。因此二者论述各有所重，而非对峙。

因此，从丹溪学派至温补学派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从阴阳对立论逐渐走向阴阳一体论，丹溪时期，由于多见相火妄动，导致阴精不足，因此更注重病理之火与人体阴精的对立关系，亦即阴阳对立关系；而至明代温补学派，由于很多医家目睹了医界妄用苦寒之品克伐人体阳气的不良风气，结合易学太极思想起而探讨命门学说，认为命门与两肾构成人身之太极，而命门之火，亦即人体之真阳，不耐苦寒攻伐，必须加以保护，不可妄投苦寒之品。而此命门之火，与两肾所藏之精，又互根互用，因此，温补学派更重视命火与阴精之间的一体关系，亦即阴阳一体论。因此从阴阳关系来分析，丹溪学派与温补学派所侧重的阴阳关系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阴阳对立，后者更重视阴阳一体。前者的“阳”指妄动之相火，后者的“阳”指具有生化之权的人体真阳。

2 治则上的发展——从“降火补阴”到“治形填精”

2.1 丹溪学派的“降火有补阴之功” 朱丹溪提出的“阳有余阴不足”论，既说明了人体的基本生理状况，又有其病理意义，即相火妄动容易导致阴虚火旺之证，丹溪认为阴虚火旺不仅是疾病的常见病理，而且是早衰的重要原因，而阴虚与火旺是密切相关的，是1个问题的2个方面，阴虚必然导致火旺，而火旺又导致阴液更伤，因此临床用药，补阴必兼泻火，而泻火也即所以补阴，临床中可谓滋阴与泻火并用。他以滋阴为本，认为滋阴有利于降火，同时，也不吝泻火药的应用，而泻火的目的也是滋阴，亦即“泻火有补阴之功”，因此临床中常应用一些苦寒降火之品，如黄芩、黄连、黄柏等，尤以黄柏为最多，因“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黄柏是也。肾得坚，则心经虽有火，而精自固”。据统计，《丹溪心法·补损门》中列方25首，其中用黄柏者多达17首，甚至有方名“大补丸”，只由一味黄柏组成，可见其重视应用降火药以达到泻火保阴的目的。如朱丹溪在《格致余论·鼓胀论》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医案“陈氏年四十余，性嗜酒，大便时见血，于春间患胀，色黑而腹大，其形如鬼。诊其脉数而涩，重似弱。予以四物汤加黄连、黄芩、木通、白术、陈皮、厚朴、生甘草，作汤与之，近

一年而安”^[4]。此案即是一则阴虚火旺的医案，丹溪以四物汤补养阴虚，以黄连、黄芩降火，兼有补阴之功，再佐以行气化湿之品，终于奏功。因此丹溪学派处理阴虚问题，是将补阴与降火并重，甚至有些病证是以降火为主，因为根据“阳有余阴不足”的理论，导致阴虚的根本原因在于妄动之相火，因此在治则上自然把降火作为重要的手段。

2.2 温补学派的“治形填精” 温补学派虽然普遍比较重视阳气的重要性，但并不将阴阳两方对立，同时也都比较重视阴精的重要作用，自赵献可开始，就提出“阴虚有二：有阴中之水虚；有阴中之火虚”，即“阴虚之中，又有真阴、真阳之不同”，将阴虚的外延扩大，拓宽了阴虚之证的范畴。张景岳认为在人的生长发育过程中，真阳主“生发”，真阴主“成立”，彼此互根互用，不能独存，所谓“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并把真阴认作阳气的根本，称阴虚、阳虚证的病机为“阴中之水亏”与“阴中之火衰”。在临证治疗中，张景岳也认为无论水亏还是火衰，都有关真阴的亏损，而精血形质均可反映真阴的盛衰，因此在临证中十分注重精血受损的程度，并指出“观形质之坏与不坏，即真阴之伤与不伤”，重视治形，填补精血。

综上所述，温补学派在命门学说的影响下，对阴虚的认识更为深刻，认为阴虚之证可再分阴阳，对滋阴治法也并非如丹溪学派将滋阴与降火并重，而是重视填补真阴，滋养精血，并善于阳中求阴。简单而论，对于阴虚之证，丹溪学派在“阳有余阴不足”思想的指导下更重视降火，而温补学派在“阴阳一体”思想的指导下更重视填补精血。

3 方药上的发展——从四物汤到地黄酒

3.1 丹溪学派以四物汤补养阴血 丹溪学派在处方用药上，补阴血喜用四物汤，若阴血虚而火旺者又常在四物汤基础上加知母、黄柏。四物汤原载于《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用治外伤瘀血作痛，后被《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录，治妇人诸疾，后经丹溪推广其用，治疗多种内伤杂症，如有学者统计《丹溪治法心要》一书，包括内外妇儿各病症共 154 种，堪称朱氏临证之大成，其中涉及四物汤之使用者甚众，多达 43 篇，计 109 次，可见其对该方的运用之广^[5]。丹溪弟子王纶在《明医杂著·医论》中说：“丹溪先生之治病，不出乎气、血、痰，故用药之有三：气用四君子，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6]，血为人体阴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治疗阴血不足诸证时，常以四物汤化裁。丹溪善以四物汤治疗内伤杂病，尤其是阴虚火旺之证，比如《名医类案》中记载“一妇患心中如火，火发便入小便，急去小便，大便随时亦出，如此三年，求治于丹溪，诊其脉滑数，此相火逆入小肠经。以四物加炒黄连、黄柏、小茴香、木通，四帖而安”^[4]。此证辨为阴虚火旺，以四物汤取效。丹溪在应用四物汤时，重视“气血关系”而立方，认为血虚者气亦不调，常以四物汤加香附、木香；血虚兼有血瘀者则予四物汤加桃仁、牛膝、生姜等，甚者加红花、五灵脂；血虚兼有

痰瘀交阻、气滞郁热者，可予和血疏气、导痰清热，药用四物汤加枳壳、茯苓、通草、陈皮、桃仁、牛膝、黄芩、甘草、姜汁。凡此之属，不胜枚举。随着丹溪学派的影响深远，四物汤在临床中被作为补阴的主要方剂。

3.2 温补学派以六味丸滋阴填精 由于丹溪学派的影响，很多医家不辨虚实寒热，动辄苦寒降火，造成医界妄用苦寒之品的不良风气，到明代中晚期，很多医家意识到顾护人体阳气的重要性，结合易学思想，探讨命门学说，发展了温补理论，在对虚损病的证治过程中，把肾的地位大大提高，并认为补肾中真阴真阳为补虚之要义。临证中在阴阳一体的思想指导下补阴或求阳，尤其是对肾中真阴不足证，用六味丸补无形之水，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对肾中火衰证，用八味丸阴中求阳，即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这一时期应用六味丸、八味丸补水益火的代表医家有薛立斋、赵献可等人。及至张景岳，更是从“阴阳互根”“精气互生”的角度提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而且景岳提出“无水无火，皆在命门，总曰真阴之病”，临床更为重视真阴不足之证，认为无论肾中水亏、火衰，总归真阴亏损，而真阴之损伤程度，又体现在形质之坏与不坏，从而发展了以重用熟地黄补益精血的用药思路，认为熟地黄乃精血形质中第一品纯厚之药。而常用方剂则在六味丸基础上创制了左归饮、左归丸来治疗真阴肾水不足证。可见，随着滋阴理论的发展，滋阴的方药从丹溪时期的四物汤加知母、黄柏发展为明代的六味丸、左归丸等方，从补阴血发展为填阴精，这其中肾在人体五脏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对“阴虚”诸证的论治。

4 小结

阴虚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尤其是金元四家之朱丹溪，将理学的动静观融入医学之中，就“阴虚”产生的机理及治疗原则，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并发展了中医学史上的“滋阴派”。该学派重视相火妄动，煎熬阴精，临床治疗降火与滋阴并重，形成了以四物汤加知母、黄柏为核心方剂的用药思路，对后世影响深远。至明代，温补学派兴起，在命门理论中，医家们更重视在“阴阳一体”的思想指导下滋补真阴，反对苦寒降火，提出了先后天根本论，发展了以六味丸为核心方剂的滋阴补肾的用药思路，张景岳更是集前人之大成，重用熟地黄滋补精血，对阴虚的内涵，以及滋阴的治法，都有更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 [1] 朱丹溪. 格致余论[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
- [2] 陶国水. 试论《丹溪治法心要》中四物汤之运用[J]. 湖北中医杂志, 2003, 25(10): 26-27.
- [3] 王纶. 明医杂著[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24.
- [4] 江瓘. 名医类案[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269.

(责任编辑: 冯天保, 钟志敏)